
重庆历史文化的特色

易 斌¹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摘要】重庆文化有较深远的历史渊源，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其历史文化特色：开拓务实、活力奔放、野性洋溢、贬官文化色彩重、集体观念强烈、边缘色彩浓、地方主义倾向严重。良莠不齐的重庆历史文化要实现其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转型，必得去粗取精，不断升华。

【关键词】重庆文化；移民文化；传统

重庆文化是在其有文字可考的三千多年历史时期形成的非常丰厚的文化遗产，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部分。诞生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从夏禹时代开始就已逐渐南移，再生于四川境内汶山郡广柔县石纽乡，娶于江州(今重庆)涂山。顾颉刚甚至说先秦时期“巴蜀就是中原，而且是中原文化的核心。”^[1]徐中舒在其《论巴蜀文化》中说：“巴楚接壤，巴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多；秦蜀接壤，蜀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2]秦灭巴国设巴郡后，巴文化加速了转化过程，尤其是当儒文化大行天下之际，巴渝地区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强劲意识濡染。

汉代的重庆地方文化进入儒家文化圈，纳入儒家文化枢轴，与儒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之中。此时长安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巴渝地区得地势之利，其文化的边缘性质减弱。但随着朝代的擅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徙，尤其是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在西学冲击下衰落后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传统重庆文化重新回到亚文化状态。重庆区域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丰富而庞杂的内容，本文在这里对其特色作如下探讨：

开拓精神。巴人并不是重庆的原住民，而是从湖北境内沿长江峡谷最早进入重庆地区的移民。此前，该移民群离开汉水和大巴山一带后，沿长江东进受阻，在楚人压制下转而西去，^[3]所以巴渝地区历史文化具有移民特色。重庆历史上有多次移民，《常志》说：“秦惠王、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4]

湖广填四川移入大量外省人，清道光年间又有大量商贩涌进；1891年重庆开埠后，人口流动随商品流通的畅通而增加；抗战时期，再次出现移民潮。移民现象形成了传统重庆文化中的移民文化特色。这种文化广采博取、活力十足而少有隋性，务实、进取，开拓精神明显。其最值得肯定的文化特色是移民背井离乡为生存为理想而怀有的执着信念，如“麻乡约”陈洪义从孤儿成长为一个负有盛名的字号掌柜，即可佐证。清初湖广填四川后，湖北麻城移民每年推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带信件和货物回乡探望，这种人被称为“乡约”。陈洪义20岁做了轿夫，成为乡约，后在昆明创办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在重庆创办了麻乡约轿行、麻乡约货运行、麻乡约民信局等，受到社会和同业推重。

务实文化。巴地深受作为中国农业三个发源地之一的蜀地影响^[4]，农耕渔猎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巴人“质直好义，风土敦厚，有先民之流。”^[5]巴渝移民为谋生、自卫和发展而形成的高度务实精神，推动了巴渝地区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冰、落下宏、涪翁、唐慎微、秦九韶等^[2]。也因此，巴渝地区的宗教气息相对淡薄，即使出现宗教，如东汉巴郡江州县令张道陵在四川青城山创立的道教，都有较强的世俗性。

¹作者简介：易斌(1968-)，男，重庆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地方主义等研究

并且，由于该地战乱少于中原地区，生活相对安定，因困顿窘迫而产生的对来世和天国的幻想就少些，而更注重对于现世的实践。但重庆人历史上对精神文化重视不够，巴人虽质直好义，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5]以至于被讥为下里巴。因而重庆的文化氛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是不浓的，少儒佛礼仪而多巫风蛮气，少文而尚武。^[7]隋唐之际，时人评价巴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8]此处“不甚趋利”应作“不重商业利益”之意解。即使到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除“五方杂处”的重庆市区外，其附近民众仍然如此。另外，重庆在长期的移民过程中又形成了码头习气、江湖味道、神仙方术、灵魂鬼神等文化糟粕。由于地域闭塞，道路坎坷，气候湿热，巴渝人在衣食住行娱乐等生活方式和习俗上，又带有自己十分独特的色彩：爽直中带有几分鲁莽，热情中带有几分狡黠，幽默中带有几分土俗，认真中带有几分滑稽，闲逸中带有几分急躁，宽容中带有几分排外^[9]。

活力奔放野性洋溢。巴渝地区大山大川，崖险水深，巴人刚悍劲勇，质直好义，绝少繁文褥礼。如巴人表达爱情直抒胸臆：“隔山喊妹山在应，隔河喊妹水应声。为啥山应你不应，流水有声你无声？”“今天出门好风光，遇到么妹洗衣裳。手中拿根捶衣棒，活像一个孙二娘……。”^[10]确有以下里巴之嫌。而正是这种璞玉浑金的质朴，造就了巴渝文化的野性活力，给暮气渐浓的正统文化起到了醒神的作用。长江横贯巴渝，巫山神女、大禹治水等传说使传统重庆文化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在这种神秘、野逸的文化氛围里最终产生了道教这一本土宗教。

而且，巴渝文化质朴少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得意忘形，与老庄思想如出一辙，因而可谓道教出现在巴蜀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道教独善其身的特点又为传统重庆文化注入精魂。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重庆文化也是正统文化活力成分的避难所或再生地，即所谓“礼失求诸野”。传统重庆文化自秦汉至近代虽然被纳入儒文化枢轴时代，但是由于始终保持了自身特性，桀骜不驯、韬光养晦，极易脱离封建正统秩序的轨道，这也决定了它易于接纳和被接纳于新兴文化思想之中。例如，作为封建社会异端出现的邹容，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疾声呼吁用革命的方式建立中华共和国，体现出典型的重庆文化精神。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连巴渝妇女都有一股悍霸之气，如著名的抗清将领秦良玉即是。魏晋以来流传“蜀出相，巴出将”的说法，就植根于这种特殊的文化土壤之中。

贬官文化。这种文化从正统文化里游离出来，包含了极大的优秀成分。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眼里，巴渝地区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蛮荒之地，适宜发配囚犯流放罪臣。在秦至清初进入巴蜀地区的人中不乏囚徒逃犯，如：“商君被刑，（尸）佼恐诛，乃逃亡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六万言。卒，因葬蜀。”^[4]

此外，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欧阳修、杨慎等人都曾作为贬官流放巴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他们在政治上的失意成就了人格和文学创作的辉煌。贬官文化显示了传统重庆文化的厚重。更为重要的是，贬官文化在中枢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起了纽带作用，将庙堂与江湖紧系在一起，独善与兼济，既体现了传统重庆文化的边缘性，也不至于使其与文化核心太疏远。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为贬官文化的发端人屈原，他忧国被贬，以死报国，为后世树立爱国典范。这不能说不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屈原》轰动山城的深层原因。

集体观念强烈。这种观念的形成导源于移民的特性和长期封闭、恶劣的地理环境。移民迁移至他乡，常常结成一定团伙、行帮、同乡会等，利用集体的力量安身立命，形成较强的群体意识。

这种意识使巴人有顾集体忘私利的传统，如：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巴郡南部蛮推选首领以掷剑和造船的技术为标准来评定，温和解决内部纠纷不折腾以角内耗损失；巴蔓子为平定内乱假意许给敌国楚王三座城池，内乱平定后拒不交城，割下自己的头颅以谢失言之罪。这种不惜以牺牲自己名誉（失言）和生命（自刎归为代价而赤诚报国的壮举，连其对手楚王也深表钦佩^[5]。其他还有如巴渝舞表现出的千军万马载歌载舞的宏大气势、川江号子抒发的团结协作勇闯险滩的豪情、南宋抗蒙之战、明末抗清等^[6]。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集中体现了全民族同仇敌汽、团结御辱的精神^[6]。但是，如果强烈的集体观念局限在狭隘的区域范围内，则会形成地方主义。

边缘色彩浓厚。传统重庆文化相对于时代主旋律而言，处于边缘状态。重庆地处四川盆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与世隔离交流不易。这里冬季少阳光，蜀犬吠日，居民见太阳出来心情激动，还要编成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传唱。因此居民普遍具有盆地意识，巴渝地区自然成为“温柔富贵乡，花柳繁盛地”；而外来移民则有“老不入蜀”之叹，因为道路的崎岖和富庶的物产使得国人叶落归根的美梦落空。汉唐时期，中国政治文化以长安为中心，巴渝地区得地势之利，边缘心态有所减弱，因而，刚劲生猛的巴渝舞进入宫廷，质朴野性的巴渝乐盛行于教坊，大时代的审美情趣与传统重庆地域文化至阳至刚的特点契合得天衣无缝。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朝代的更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其边缘色彩渐浓，复归于保守的盆地意识。尽管该地在各时期不乏精英志士，但总体趋势表明：巴渝人若不东出夔门，就难有作为；另外，外来移民盘桓巴蜀，极易利用该地地方主义条件，在时机成熟时成割据之势，历史上巴渝地区的割据政权几乎都是由外地人建立的，如东汉据益州称帝的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中，刘备是河北人，诸葛亮是山东沂南（琅邪阳都）人，李严是南阳人，关羽是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人，张飞是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五代前蜀建立者王建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后蜀建立者孟知祥是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前）人；大夏政权的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所谓“川人出川，北人入川，能成大器”，即此意。

重庆文化的边缘性加强了地方主义色彩。重庆本土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地方特性，“蜀不变服巴不易俗”^[1]，巴渝人的地域意识非常顽固。苏秉琦认为，“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只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这种文化“约有五千年到三千年，上下可以串起来，成系统，有特征。”^[2]重庆本地人抵御外来势力的精神十分顽强，如张珣王坚在钓鱼城打死蒙古大汗蒙哥，抗元三十六年，而元朝终其一代也不过百年左右。

在此顽强的地域意识冲击下，即使是极具个性的外来文化也会被弱化，乃至同化，例如回迁开县的广东客家移民，出门在外也不得不放弃客家话。重庆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山高坡陡坑深，夏季多烈日，物产不丰，居民性情粗犷，社会舆论易为少数人左右，所以群氓现象明显；加之，穷山恶水出刁民，帮派组织如浑水袍哥在历史上十分活跃，这促成地方主义的产生，导致巴渝历史上特殊时期里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的隔离和抗衡。朝廷权威往往对偏居西南一隅的巴渝地区鞭长莫及，天高皇帝远，最终形成“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历史景观，如保路运动的原因之一即为此。总之，传统重庆历史文化可谓良莠不齐，对其认识也是见仁见智。重庆文化要在新时代实现其现代性转型，必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31-2304.
- [2] 蒋宝德, 李鑫生. 中国地域文化[M]. 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7: 2276.
- [3] 邓少琴. 巴蜀史迹探索[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林永仁, 来层林. 巴楚文化[M]. 华文出版社, 2000:9-56.
- [4] 蒙文通. 巴蜀古史论述[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87-100.
- [5] [晋]常醇, 撰, 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M]. 巴蜀书社, 1984:28-32.
- [6] 薛新力. 传统重庆文化史[M]. 重庆出版社, 2001:374-377.
- [7] 传统重庆文化:第三辑, 1994:152.

[8]《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

[9]新华网.

[10]张老侃,等.重庆风情幽默画卷[M].重庆出版社,2003:53.

[11][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M].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1402.

[12]霍巍,等.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M].巴蜀书社,1994.